

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文体意识

□ 左东岭

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文学思想研究中心 北京 100048

作为历史研究领域之一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应当遵守的学术原则之一便是所有的研究结论都必须建立在充分占有证据的基础之上。而作为文学研究领域之一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又具有对研究证据的更加特殊的要求。这一特殊化要求便是使用证据时讲究文体特征与文体意识的精细化追求。因为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目的就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真实内涵的发掘与说明,因而在使用文献时便会涉及反映这些思想观念的种种不同文体表达方式,诸如诗论、文论、词论、曲论、诗话、序跋、评点等等,而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乃是将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也即要从文学创作实践中归纳提炼出文学观念以与其理论相印证,在使用文献时又会涉及诗文创作的多样化文章体式。在中国古代,这些复杂多样的文体样式乃是为了实现各自不同的文章功能与创作目的而长期积累形成的,文人在写作时也体现了他们许多独特的思想情感与实用目的。但是到了现代学者手中,却往往成为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文献,成为证明其各种研究结论的证据。在此,就存在一个重要的古今差异问题,就是将文体多样、内涵复杂的古代创作简化为平面归类的研究文献使用。这在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理论史及中国古代美学史中体现的至为明显,学界往往将复杂多样的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文献载体统统归纳成各种符合现代文学理论研究范畴的资料汇编,而学者在使用这些文献时也仅仅将其视为各种文学观点的直接表达,而对于原来作者的创作目的与表达方式漠然视之,并最终影响了对于历史真实内涵的探索。因此,有必要在检讨传统研究缺陷的基础上,对于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中如何处理不同文体所体现的独特文献功能进行具体的分析论述。

由于对诗话理论价值的过分偏爱,许多学者不再关注诗话“资闲谈”的文体功能,更有甚者乃至否定诗话具有文体的属性。其实诗话的文体特征在诗

话自身研究,尤其是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资闲谈”的文体属性绝非仅仅体现其表达的“形式自由”与“笔致轻松”,而是其真实诗学观念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其次,诗话常常记述当代诗坛掌故与人际交往,故而具有现场感与真切性,从而为文学思想研究的历史感提供了证据支撑。再次,诗话往往是对诗坛整体状况与文学思想潮流进行把握的有效载体。诗论虽然对诗学范畴及创作方法具有系统而深入的论说,但却很少对于诗坛实际状况尤其是当代诗坛的总体趋势、流行观念等进行具体的描述与把握,而诗话恰好弥补了这一环节,对于中国文学思想研究来说,诗话是连接作家个体创作实践与文学理论批评的中间地带,是实现其对文学思潮予以立体性与过程性考察的最佳文献。

自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以来,序跋已经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研究古代文论的代表性文献,然而,序跋就其原初意义而言,乃是古人创作之文章,具有其文体的独立功用,与《文心雕龙》《谈艺录》《原诗》等文论著作以及李德裕的《文章论》、李清照的《论词》等直接讨论文学问题的文章依然有重要差异。此种差异的混淆所导致的绝非仅仅是名实是否相符的问题,而是能否真实完整地认识古代文学思想内涵的重要问题。序与题跋尽管被现代文献整理者均视为表达文论看法的同类文献,但在文体属性上它们之间却颇有差异,文体特征也不尽相同。在现代学界一向被视为诗论文论文献的序跋,其实是具有自身的文体规定与复杂的创作情况的,因而不能仅仅依靠逻辑归纳便抽绎出所谓的学术结论。在面对这些序跋文献时,必须将其每一个文本都视为一篇独立的文章创作,认真分析其结构,深入探讨其意旨,弄清其语境,理清其脉络,严格区分作者看法与被序跋者的观点,然后才能获取结论并判定其价值。

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与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理论史等传统领域在研究方法上最明显的区

别,就是将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对古代的文学观念进行立体性与过程性的考察。这种研究方法的好处在于扩大了研究的视野与文献使用的范围,但同时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由于其研究文献除了涉及传统的文论、诗话与序跋外,更扩展至所有的文体类型,而要从这些文本中提炼出观念性的文学思想,就会遇到更为复杂的情况。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作为体现文学观念的诸种文本形态,其与作者思想表达的关系是有远近区别的。序跋被视为最能体现作者文论观点的文体,所以会被传统的文论研究列为理论批评文献。然后是尺牍,因为它能够比较直接表达作者的看法,因而谈到文学问题时也就较为明白可信。还有诗歌作品,因为它们作者思想情感表现的最佳载体,也就容易透露出作者关于文学的态度。而那些讲究形式华丽的骈文辞赋与具有实用功能的章、表、诏、诰、碑、铭等文体,相对来说对作者个人思想观念的表达就要更为曲折隐晦甚至完全被遮蔽。二是要充分认识到作者与叙述者并非是完全一致的。这在当代叙事学中已经是基本的常识。其实,不仅叙事作品如此,抒情性以及其它类型的文体也大致如此,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的文章写作中,均有各自的文体功能与体貌规定,作者一经进入某种文体的写作,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进入到一定的角色叙述中,从而与现实的自我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有时候为了实现自己的某种创作目的而不得不忽视甚或掩盖住自己的某些想法。另外,还要考虑到具体的创作语境,也常常会影响到作者思想的表达。比如即使在最能直接表达自我想法与态度的尺牍写作中,也会有上司、同僚、朋友与亲人的差异,不能指望一封公文尺牍与一封私人书能够表达书写者同样真实的想法,更不要说其他与作者关系更远的文体了。

既然存在着如此复杂的情况,因而在从各类作品中概括归纳文学思想时,就不能只将其视为普通的研究文献予以简单的处理,而是要结合作者的生平遭遇、创作目的、叙述策略及潜藏心理进行认真的解读,尽力发掘出作者真实完整的观念形态。

在从文学文本中提炼概括文学思想时,必须关注到两个基本的层面:一是对于每个文本的解读都应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存在,是作者为了实现自我的创作目的而精心结撰的结果。当现代学者面对这些文本时,既要关注文学思想层面的内涵,又必须充分顾及文本作者所要实现的写作意图,并在这二者之间反复辨析思考,以求得出符合文本作者真实思想内涵的结论。从此一角度说,这种研究首先是文学史的文本分析,然后才是文学思想史研究的观念提炼。二是对于文本之间的关联性研究,将不同文本视为作者不同思想层面的表达。由于文体属性的

差异和创作目的的不同,作者难以将自身的所有看法与感受在某一种文体、某一个文本中作出圆满充分的表达,因而必须将各种不同文体的文本加以认真比对,既要总结归纳其一致的思想观念,又要发现它们之间各自所侧重甚或相互矛盾的方面,并分析其背后的复杂成因,最终才能得出接近其真实文学思想的结论。这期间最为重要的是,每个文本都要关注其体式要求与功能规定,同时更要仔细辨析作者写作时因个体需求与叙述策略而导致的独特性。因为只有如此,研究者对于文本的解读,对于观念的提炼才是更有针对性的,因而也才是更为接近历史真实的。

文学思想史的研究需要转向精致化,它不仅要超越传统的研究范式,更要检讨传统文学理论批评处理文献的弊端;它不仅要关注创作实践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更要关注如何从诗文作品中提炼文学观念的有效方式。我认为,强化研究者的文体意识,就是将文学思想研究精细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它不再将文学理论批评的文献视为不加区分的研究资料,而是区分为不同种类、不同文体与不同功能的文本,并采取相应的研究方法去发掘其不同层面的文论内涵;它在面对传统文学批评史视为论文主张的载体序跋文献时,首先关注的是这些序跋作者所呈现的书写目的与叙述策略等文体功能,然后再从中剥离出所蕴含的文学观念;它在从诗文作品中提炼概括文学观念时,首先要做的是依据不同的文体规定,寻觅其结构脉络、创作主旨及行文技巧,然后再揭示其隐含的思想内涵,同时要将性质相近的各种文体的文本加以对比辨析,从而在总体上把握作者的文学思想体系。这种精细化的研究,不仅需要研究者具备概括能力与分析能力,更要具备敏锐的审美感悟能力、良好的文本解读能力以及贯通文史哲相关学科的综合能力。可以说,没有对各种文献进行文本解读的精细化处理,就很难真正实现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求真目的。

其实,精细化研究不仅仅中国文学思想研究的需要,也是提升整个古代文学研究水平的需要。因为将不同文体种类的文献作研究资料的一般化处理,不仅仅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个别现象,而且也较为普遍地存在于诗歌史、戏曲史及小说史的研究之中。像文学思想史研究一样,作为一般的古代文学研究,在解读文本与分析文献时,也需要具有清晰明确的文体意识,也需要弄清每一个文本的生成语境与书写策略,从而提升其研究的严谨性并获取较为可靠的学术结论。精细化的研究是一种良好的学风,是一种优雅的品质,但其最终目的依然是得出更符合历史事实的学术结论。

■ 《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约18000字